

论韩愈诗歌的写实精神

郑宏华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①；“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②。韩愈是较早把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的人。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也不乏受李白豪迈俊逸诗风的影响，写出不少狂怪不羁、变幻开合的诗章。然而，韩愈毕竟是韩愈，就他生活的时代和个人所崇奉的哲学思想及其形成的审美风范，使得他不得不大致走着杜甫开拓的诗作道路，即以儒家诗学为其准绳的创作规则。这种创作规则，内容上注重国计民生，注重社会功用；写作上讲求对人情物态的描摹、刻画。一句话，这是一种求实、写实的创作精神。

韩愈诗歌的这种写实精神，首先体现在他诗作的题材方面。在韩愈的诗集中，大量的就是他关注社会、关注政治的“实录”。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是一个动荡纷乱的时代，其中虽有过所谓宪宗朝的“唐室中兴”，但就整个唐代江山来看，实在是走下坡路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朝政暗弱、宦官掌权、藩镇割据，这一切又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统治集团，与当时的广大劳动群众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而这种社会矛盾，又危及着唐室江山的稳固性。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的韩愈，面对着这些社会危机，他焦虑、思索，试图寻找解决矛盾的出路，而这一切复杂的情绪、内容，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则构成他以描写现实为其主要内容的写实特色。这个特色，贯穿着韩愈诗歌创作的始终。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正在彭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处为幕僚。这时，藩镇已成大患，贞元十五年（799）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反；九月，唐王朝讨伐之，但由另一些藩镇组合而成，既无统帅，每出兵往往各自规利，进退不一，十二月，诸道兵溃。在这场兵乱的前一年（贞元十四年）冬，无雪，京师饥；战发的当年秋，又遇郑、滑大水。天灾人祸，国乱扰扰，民不聊生。韩愈作为节度使的使者到了长安，“屡陪高车驰”的经历使他又观察到了朝政内幕，炙手可热的李实奸诈异常，唐德宗对跋扈的藩镇是“覲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③，何等的迁就、软弱无力。严酷的社会现实折磨着韩愈的心灵，从京城回徐州后，他写下了有名的《归彭城》：“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诿谩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但是，当时的韩愈人微言轻，纵使胸怀琅玕，腹有良谋，也只能“絨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蠹。归来戎马间，惊顾似羈雌。连日或不语，终朝见相欺。乘间辄骑马，茫茫诣空

陂。遇着着酩酊，君知我为谁？”本是为社稷计，为江山计，但既无缘“至形擿”、“进短策”，又无知音可倾吐，诗人只有一腔悲愤，满腹愁怀，酩酊醉酒，穷途恸哭。

后来的韩愈职位升迁，也较为可观的飞黄腾达了。但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他颇具忧国忧民之心。永贞元年（805），韩愈徙江陵途中追忆贞元十九年（803）贬阳山的经过情形，写了《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在这首诗里，韩愈真实地展现了天旱人饥的灾情：“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佇立久咿嚅。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这时的韩愈，“适会除御史”（“监察御史”），他看见一面是路有饿殍，一面又是“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据《顺宗实录》记载：由于天旱，唐王室不得不诏免租税，但权奸李实是有名的聚敛之臣，京畿老百姓食不裹腹，李实却一如既往地聚敛征求，对唐德宗上奏：“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于租税不免，老百姓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如实反映了灾情，请求停征赋税。这样的态度很可能得罪了李实及其同伙，所以韩愈不明不白地被贬阳山了。韩愈写这首诗距遭贬已三年，但在其诗中描写的灾民图却那么形象鲜明，可见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地触目惊心地刺激着诗人。韩愈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下了这些社会现实，在今天看来，除了有其历史的认识价值之外，他那儒家思想中以民为本的进步成分，使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一种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这种民本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那些贪官污吏，只知恣意鱼肉人民如李实之流，无论就哪方面说来，都不知要高多少倍！

韩愈诗的写实，除了直接描写民间疾苦的以外，尚有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诗篇。前面已经说过，藩镇割据是中唐社会的一大患。早在贞元十年（794），年轻的韩愈便在一首《古风》诗里抨击过藩镇势力的飞扬跋扈。贞元十五年（799）二月，汴州发生军乱，韩愈有《汴州乱》二首，诗中写到：“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在军乱中，诸侯不救，朝廷不管，充分看出德宗朝姑息养乱、藩镇各自为阵的情景。韩愈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不放过任何机会，议政议军，希冀平乱。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寇唐州，掠居民千余而去，在这“请看工女机上帛，半作军人旗上红”④的形势下，“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用命”⑤。韩愈在《赠张徐州莫辞酒》中写道：“莫辞酒，谁为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战士岂得来还家？”又于《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说：“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可见韩愈对平乱是非常关切的，上至朝廷，下至方伯，无不一一谏议、请讨。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领兵平蔡，韩愈以行军司马随之前往，他不仅身体力行，参加平乱，更以他的诗才，记录下了这次平乱的始末。《过鸿沟》借古喻今：“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这次平乱，在朝廷中是有过一番争议的（详见韩愈《平淮西碑》），而这首诗，正是借咏楚汉之事，暗讽那些阻止伐蔡平乱的人。对于这次平乱胜利，韩愈更是高唱凯旋：“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侯远，相公新破蔡州回。”⑥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庆元年（821）七月，镇州军乱，节度使田弘正被害，推衙将王廷凑为留后。第二年二月，诏雪王廷凑，朝臣中大多慄缩不前，而韩愈时年已五十四岁，却勇行前往，连元稹都说：“韩愈可惜。”韩愈不仅以其凛然正气使乱军伏地，而且在途中两酬裴司空（度）：“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⑦。“衙命山东抚乱

师，日驰三百自嫌迟。”⑧这既是诗人亲身经历的记录，更是那个时代面貌的一端。

中唐时病，尚有宗教患。唐初及盛唐儒、佛、道并行，发展到中唐，释、道二教严重影响国计民生。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但事实上却成为当时的一大公害。《旧唐书·彭偃传》说：“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彭偃与韩愈同时，从彭偃上书可知当时的严重情形。韩愈在《原道》中亦有类似记载。因此，韩愈一生辟释、道不遗余力，自然亦有大量诗篇反映这一概况。《送僧澄观》、《送灵师》，不仅指斥佛教引起的骚扰，而且具体描写了其危害性。唐代制度：老百姓担负国家直接税及劳役者为课丁，能够免除这种税役的特权者为不课丁。不课丁只有统治阶级及僧尼道士女观等宗教徒才能享受。在宗教徒中，佛教徒最占多数，其危害性在诸宗教中尤为特著。韩愈辟佛也最卖力，元和十四年（819）谏迎佛骨更是有名的历史事件。正如他自己在诗中写的：“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⑨这次事件，他自己险被处死，免死后被贬潮州，减罪后也只量移袁州。更为悲惨的是韩愈的第四小女，时年十二，当时重病在床，韩愈被贬，有司认为有罪人家不可留京师，韩愈只好携家离去，其女病死于途中，到元和十五年被诏回京，才携其骨归葬，并作诗志之。唐代佛教极盛，道教也沾唐王朝认老子作本家的光，大行于世。不过，道教的宫观与佛寺一样，不仅成了避难所，更有变成污七八糟场合的。《华山女》就披露了这种事实：“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官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鞚并。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钿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颌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前面说过，当时佛教较之道教更盛，所以“街东街西”，宫闱朝廷，撞钟吹螺，大讲佛经，而“听众狎恰排浮萍”，何其众也！相形之下，“黄衣道士”那里却门庭冷清，听众寥落。然而，“华山女儿”来演“真诀”就不同了，本来秘而不宣，却“訇然振动如雷霆”，一下子车水马龙，“骅骝塞路”，观里观外，人山人海。妖冶的女道士“抽钗脱钿”，“堆金叠玉”。这样的角色居然深得“六宫”、“玉皇”的赏识，“豪家少年”亦“来绕百匝脚不停”。这些人真的是听演说吗？诗里说得明白，只不过是“识师颜形”而已。朱熹说：“此正讥其街娑色，假山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女得入官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褻慢甚矣。岂其以神仙处之哉！”这个评语虽有理学家气，却是深得诗旨的。韩愈尚有《谢自然》、《谁氏子》等诗，批评道教败坏社会风气，影响耕桑之业，并告诫人们：“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不要轻易“从物迁”。韩愈为配合恢复儒家道统，又为当时社会经济考虑，对佛、道的排斥是最勤最力的。关于斥道，陈寅恪先生评价说：“退之排斥道教之论点，除与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尚有二端所应注意：一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退之以臣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不稍讳避，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倡者，蠹政伤俗，实是当时切要问题。”的确，在那样的背景下，要站出来批评是需要勇气的。

总之，韩愈虽然宣称自己是“余事作诗人”⑩，但儒家浓厚的入世思想使他具有一种强

烈的社会使命感，所以他始终浮沉在社会政治的旋涡之中。由此，他的诗作便大量摄取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及其各种社会问题，使他这部分诗歌具有时代镜子的认识作用。

二

我们说韩愈诗歌具有浓郁的写实精神，除了在题材内容方面切入社会现实以外，在写作手段上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情物态的细致描摹和精工刻画。这种手段是写实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韩愈诗中不少地方写到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面貌比起盛唐那种取其神、略其形的写法，更具摹其形、出其神的特点。《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写遭贬后的家中情形：“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露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僮僮不回顾，行行诣连州。”五联诗写五个人，除“稚子”外，其余各人各态，全都体现在细致的描写之中。《华山女》对女道士的著墨：“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展现出一幅生动具体的人物肖像图。许颢《彦周诗话》说：“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环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为娼妇。退之《华山女》诗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此定是女道士；东坡作《芙蓉城》诗亦用‘长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长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便有神仙风度。”这些诗句之所以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身份，关键在于诗人从人物的特定衣着、神态、举止等细微处入手，像工笔画一样勾勒，突现出人物的特点。韩愈对《华山女》的描写，便把女道士的“玄姿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使一读便觉得写的是女道士的形象而不可移易。靠着这种写作手段，韩愈在《寄卢仝》中写出了个甘居淡薄而德高望重的诗人形象；《泷吏》则更是吸收民间俗语，把泷吏的诙谐、敏捷、善言而又正直的性格表现得维妙维肖。韩愈这种描摹人物的手段，可以说是借鉴了散文手法，表面看上去似乎琐碎细小，实则能擒能纵，能缩能伸。不仅表现人物，写其它景物也极富表现力。如《南山诗》中，有这样一个精彩的场面：“昆明大池北，去觐偶晴昼。绵绵穷俯视，倒侧困清沍。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狻，惊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碧空无际，青山绵亘，映入绿波，水天一色，俯视水波动荡，山影若将若碎，仰视山形，乃喜其未倾。整个画面风景绮丽，猱狻稚态，跃然纸上，趣味横生。不过，《南山诗》从各个方面穷情极象的描写、刻画，当然也是这种手段的运用，却又嫌太过了。

韩愈还有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体物工致，令人赞叹。《早春》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黄叔灿说：“‘草色遥看近却无’，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确实，淡淡几笔，早春气息便扑面而来。写水：有“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⑪有“轻浪参差鱼动镜”^⑫，有“寒日夕始照，风江远渐平”^⑬，无论是静水微澜，还是风江远波，捕捉形象都极准确，描写也尽量精当。写雪：“气严当酒换，洒急听窗知”^⑭，“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销”^⑮，一寒一暖，春冬分明，非工稳精巧，不能如此分辨。不仅如此，韩愈还善于运用色彩的衬托，使物象更加鲜明具体。“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⑯，这真是愈淡愈浓，透出“晚更红”的景象。“粉墙光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⑰，“山楼黑无月，渔火灿星点”^⑱，那山庙的清幽，渔火的神妙，一切都在迷离惆怅的氛霭中给人印象鲜明。对客观景物的精细描写，来

自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宿龙宫滩》写水声：“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茗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说：“黄鲁直曰：‘退之裁听水句尤见工，所谓浩浩汤汤抑更扬者，非谪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耶？’”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韩愈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写实的。这个实，既有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又有从细微处描摹的人情物态。这二者有区别，同时又有联系，许多复杂的内容正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们水乳交融，共同构成这写实的风貌。

三

韩愈诗歌的写实，是否就是历史和客观事物的机械再现呢？当然不是。韩愈在《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中说：“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频染。”有名的《送孟东野序》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可见，无论诗人歌吟什么，描写什么，都是内心的“多感”、“弗平”的具体表现，都浸透着诗人浓烈的情感倾向。只不过这种写实的创作精神是把丰富的情感因素寓于具体的意象之中，而不是像浪漫派诗人那样直抒胸臆，倾泻情感。前面提到的《华山女》，全诗没有一句议论，没有一处指斥，但读之掩卷，其道教的虚伪，皇家贵族的傲慢，无不历历在目，难怪查慎行评价说：结语“二句与老杜《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校含吐蕴藉。”约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的《题木居士二首》之一：“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表面看来，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生活场景：一株老而怪的古树，偶然被题作木居士，人们便向着老树祷告祈福。细玩诗味，却发现它另有一段深情妙理，只是诗人采用冷隽的笔调，表现得曲折委婉罢了。旧注大多以为此诗是指斥王伾、王叔文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其实，这种诗作自有一种超越力量，它概括了许多世态人情，这当然是诗人寓情于物所达到的艺术效果。

韩愈诗歌中有这种情感因素比较隐蔽的，同时也有非常显豁甚至直接发抒的。在《归彭城》中，诗人就非常奋激地歌吟道：“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剖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前一年所作《龔龔》诗亦说：“报国心皎洁，念之涕洟澜。”“愿得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诗人恨不得进入朝廷，充任谏官，上献良策，安抚天下。从诗中体现出一幅按捺不住的样子，其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然而，诗人的这种情感发抒仍然是夹杂在客观的事物描写之中，其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没有脱离其实的、具体的、沉着可感的物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抒写方式既是主情的，又是写实的。

韩愈诗歌的情感倾向还可以从他对政治事件的评判中去考察。永贞元年（805），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活动，即有名的“永贞革新”，从当时的社会概况看，这是“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⑩。但是，韩愈却在《永贞行》中称这次改革为“小人乘时偷国柄”；《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又说：“赫然下明诏，首罪诛共罔。”把王伾、王叔文的遭贬比作流放的共工、驩兜。当然，“永贞革新”施行时韩愈并未在京师。在这前两年（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阳山。顺宗继位，韩愈遇赦，他满以为要诏令自己回京，结果却是徙江陵府法曹参军。因此，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除远离事件中心

外，可能还夹杂着个人意气。不管怎么说，从韩愈诗中流露出这种情感，既能看出他政治立场偏于保守，又可说明他在诗歌的写实中倾注了自己评价事物的情感倾向。韩愈在《元和圣德诗序》中曾标榜自己“指事实录”，这种“指事实录”，韩愈似乎也用于其它诗歌创作了。只是在具体的“指事实录”中，作者的眼光、情感，是衡量事物的天平和法码。

四

韩愈诗歌形成写实特色，首先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思想有关。中唐社会，矛盾重重，适应封建集权统治的儒家思想再一次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支柱。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形成一股以儒家美学观念为其主要特征的文艺美学思潮。韩愈在散文领域大力提倡文以“传道”，其道便是儒家思想之道，这种主张无疑要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整个中唐诗坛来说，还有以白居易为首提倡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儒家诗教传统。有了这种社会氛围，韩愈的诗歌创作当然要受制于“这一个”时代潮流。

再有，韩愈个人是地地道道的儒化思想，儒家的诗教理论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命脉。而这种诗教理论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地提倡“诗言志”。既然韩愈的“志”是儒家的积极入世，那么整个社会的安宁、动乱、发展等等，都应是他关心的对象。韩愈一生，又尽管升沉迁降，不乏坎壈，但他自始至终官运较为亨通，这就更应该“达则兼济天下”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是诗人心灵的震颤，而诗人生活的时代、诗人的思想等因素又会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这便是韩愈诗歌形成写实的直接原因。

另外，这种写实特色尚有其历史渊源。文章一开始我们便说过，韩愈的诗作道路与杜甫一脉相承，王闿运就曾明确说过：“韩愈并推李杜，而实专于杜。”关于杜甫的诗歌美学观，已有不少文章论证属于儒家美学范畴，而他所开创的创作道路，在中唐社会恰恰契合了韩愈这类诗人的诗美观。因此，在韩愈的诗作中，不仅创作精神师承杜甫，其语言句式、诗歌意象、风格韵味都有极似杜甫之处。《归彭城》的“剖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说如出一辙。“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停立久咿嗟”，这实际上是“路有冻死骨”的扩大，只不过一“饿”一“冻”罢了。而“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何焯便赞叹：“老杜家数”。像“道边草木长，红紫相低昂”^②，直是从“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之境界化来。其“柳花闲度竹，菱叶故穿萍”^③，黄钊增注说：“直是少陵”。程学恂《韩诗臆说》称赞《答张十一》（“山静江空水见沙”）是“真得杜意”的佳作。韩愈在《醉留东野》中，以李、杜喻己和孟郊，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推崇备致。清人有宗三元（杜甫：开元；韩愈：元和；苏轼：元祐）之说，《巢经巢集序》也明确说学诗从苏轼、韩愈以规少陵，如此等等，皆可表现出韩愈与杜甫之渊源关系。当然，韩愈的写实从形式上力求学杜甫的地方多一些，就内容的深度、广度来说，却显得逊色一筹。这里有其时代因素，杜甫虽处乱世，但那时毕竟离开元盛世不久，对文化人的管束相应地要和缓些，诗人还可以较为大胆的暴露时弊，吐露心迹。而韩愈所处的时代政治形势便要险恶得多，刘禹锡曾因为作诗“语涉讥刺”^④而遭贬黜，白居易的讽喻诗也引起“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⑤，在这种形势下，诗人鸣不平是有所顾忌的，并要考虑方式的。这也是元和以后的一些诗人，大多爱用偏于深微的比兴手法的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恐怕是与诗人的身世有关，韩愈年轻时遭遇与杜甫相似，逗留

京师，三上宰相书而不见用，尔后也只在地方势力处谋作小官。但三十五岁以后的韩愈虽“三黜”其身，却一直在做官，地位比当年的杜甫显赫：“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④。“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⑤。生活也优厚得多：“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⑥。韩愈做官的经历杜甫没有，而这样美的所在杜甫一辈子也没梦想到。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宗元文学辞章的成就是他“斥久”、“穷极”的产物，那么韩愈自己则是“斥不久”、“穷不极”，所以，显赫的地位使他卷入政治，优厚的生活又使他减少了人生痛苦的体验。这样，他的诗中虽有杜甫那种忧患意识，其分量却显得轻淡得多。

综而论之：韩愈诗歌的面貌尽管较为多样，但写实是其基本特色。这既是诗人个人的风格特征，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尝一脔而知九鼎，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唐的诗歌风貌，或可有所裨益。

注释：

- ①《调张籍》。
- ②《荐士》。
- ③《新唐书·藩镇传》。
- ④《莫辞酒》。
- ⑤蒋之翘语。
- ⑥《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 ⑦《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
- ⑧《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 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⑩《和席八十二韵》。
- ⑪《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 ⑫《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
- ⑬《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
- ⑭《喜雪献裴尚书》。
- ⑮《春雪》。
- ⑯《题百叶桃花》。
- ⑰《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 ⑱《潭州泊船呈诸公》。
- 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 ⑳《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 ㉑《闲游三首》。
- ㉒《旧唐书·刘禹锡传》。
- ㉓《与元九书》。
- ㉔㉕并见《示儿》。